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明初南京皇城宮城的規劃、平面布局及其象徵意義

The Planning, Plan Layout and Symbolism of the Imperial Palace Compound of Nanjing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doi:10.6154/JBP.1993.7.006

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7), 1993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7), 1993

作者/Author : 徐泓(Hong Hsu)

頁數/Page : 79-9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1993/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54/JBP.1993.7.00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明初南京皇城宮城的規劃、平面布局及其象徵意義

徐 泓

The Planning, Plan Layout and Symbolism of the Imperial Palace Compound of Nanjing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by
Hong Hsu

摘 要

明太祖打破明以前南京城市的格局，拓建南京城，於城東空曠之地規劃建設皇城與宮城，以突顯中國傳統王者之都的氣象，其平面布局及顯現的象徵意義，對明中都、明清北京的影響頗大。本文旨在敘述明初南京宮城與皇城的規劃、建設的過程，討論其平面布局的特點及其象徵意義，並分析其與元大都、明中都、明清北京皇城、宮城規劃之淵源或影響。

ABSTRACT

When Ming Taizu (r. 1368-98) expanded the city of Nanjing he broke free from the city's pre-Ming arrangement and built the imperial palace compound in an open ground to the east of the city. This was to enhance the imposing atmosphere that characterized the imperial capitals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 plane layout, as well as its symbolic meanings, of the Nanjing palace would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entral Capital (Fengyang) later in the Dynasty and the city of Beijing in both Ming and Qing periods. This study describes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Nanjing palace during the early Ming and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ymbolism in its plane layout. It also traces the continuities and changes between the planning of this palace and that of Dadu in Yuan, Fengyang in Ming, and Beijing in the Ming-Qing era.

民國82年5月10日收稿

*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兼學部長，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休假)

Manuscript received on May 10, 1993.

* Professor of History, Founding Head of the Division of Humanities,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n Leave),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南京是中國七大古都之一，自六朝以降，十為國都，垂四百五十年；尤其明初，明太祖打破以前的都城格局，拓建南京城，在城東空曠之地規劃建設皇城與宮城，以突顯中國傳統王者之都的氣象，其平面布局與顯現的象徵意義，對明中都、明清北京的影響頗大。作者十餘年前曾為文簡略討論，近年來讀到一些相關論著與資料覺得舊文須補正演繹之處甚多，乃起意專就南京的皇城、宮城，論其規劃、建設的過程及其平面布局的特點及其象徵意義，並分析其與元大都、明中都、明清北京皇城、宮城規劃之淵源或影響。

一、皇城、宮城的規劃與建設

朱元璋起兵淮北，因馮國用、陶安、陳瑄先等人的建議，渡江取南京，作為「順應天命」的「革命」基地，(註1)當時朱元璋名義上仍是龍鳳政權下的臣子，以吳國公兼領江南行中書省事，改元御史台為吳國公府。(註2)經過十年的征戰，討平陳友諒，進而征討張士詩，大勢已定，乃於至正廿六年(1366)四月，公開與紅巾軍劃清界線，朝向自立政權發展。(註3)新政權當有新居以顯現新氣象，於是在八月下令「拓建康城」，以原來的吳國公府在城中，宮室「稍狹隘」，「乃命劉基等卜地定，作新宮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三)里許，故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註4)十二月，「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命有司營建廟社，立宮室」。(註5)工程進行得很快，次年，即吳元年(1267)二月，都城拓建工程完成；(註6)八月，園丘、方丘及社稷壇等國家祭祀典禮建築完成；(註7)九月，太廟與新的皇城及宮殿建築完成。(註8)主要工程依靠軍工，在短短一年零一個月內完成。十二月，北伐蒙元的部隊已底定山東，南征的部隊已降服方國珍，並攻入福建、廣西，捷報頻傳，群臣勸進，朱元璋「御新宮，以群臣推戴之意祭告于上帝皇祇」，宣布「明年正月四日」登基。(註9)於是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日乙亥，朱元璋「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註10)接著便於正月初七日，「自舊內遷新宮」。(註11)是為皇城宮城的第一期建設。(圖1)

朱元璋稱帝建國後，頗以建都與國防設計為憂。當時最大威脅為北方蒙古，防邊須重兵，若付之諸將，恐尾大不掉；若將兵權直隸中央，則南京離北邊太遠，指揮不易。折衷辦法，只有仿古代兩京制度，乃於洪武元年八月正式下令：「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註12)但南京的地位始終不穩定，因為它是「六朝舊地，國祚不永」，過去凡以南京為首都的，均為偏安而國祚不長久之王朝，名聲一向不好，不吉利。(註13)所以洪武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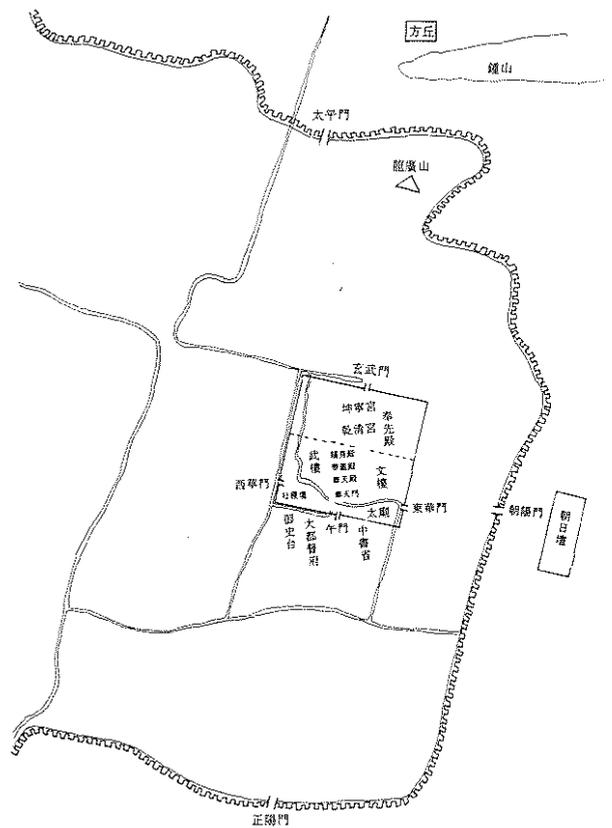


圖1 明初皇城宮城第一期建設示意圖

年，朱元璋重提建都問題，召集大臣討論。由於「稽歷代皆都中原」，大部分的廷臣主張建都北方，有的主張「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有的主張「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里適均」，有的主張「汴梁，亦宋之舊京」，也有主張「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之可省民力」。朱元璋認為這些建議「皆善」，但是「平定之初，民未甦息」，「若建都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所以只好仍以南京為都城，但南京「去中原頗遠，控制良難」，乃另外營建中都於「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中天下而立」的臨濠。(註14)於是洪武二年九月，開始集中力量營建中都。(註15)而南京城的修建工程因此不大積極進行，洪武六年(1373)，三月中都營建工程結束之前，南京皇城、宮城的建設，雖添建了旗纛廟、城隍廟、群神享祀所、功臣廟、馬祖諸神壇、先農壇、天下諸神祇壇、朝日壇、夕月壇、齋宮和奉先殿，但只有朝日壇、夕月壇、齋宮和奉先殿是營

建中都期間建的，工程都不太大。(註16)其他都是下令營建中都前建的。中書省曾要求營建後堂，朱元璋便以「土木之工連歲不息」為理由拒絕，認為「俟民力稍舒，為之未晚也」。(註17)

南京皇城、宮城的第二期整建工程的開展，是在洪武八年(1375)四月「以勞費」「詔罷中都役作」之後。(註18)中都既已放棄，遷都北方也暫時無法實現；只好以南京為首都。於是七月開始重新規劃改建皇城、宮城內的宮殿與廟壇，使「其規模益闊壯」，並改良其「未盡合禮」之處，其中仿效中都的規劃與布局之處不少。(註19)洪武九年(1376)十月，將太廟由宮城東南隅遷建於「雉闕之左」，在宮城左前方。(註20)十年(1377)八月，「改作社稷壇於午門之右」，即由宮城西南隅遷建於宮城右前方。以合乎「左祖右社之意」。太廟與社稷的建置便是仿自中都。(註21)並且改建圜丘與方丘，將祭天的圜丘與祭地的方丘合而為一，建大祀殿。(註22)十年十月，「改作大內宮殿成」，據《實錄》云：「制度皆如舊，而稍加增益」。其實不是「稍加增益」而是大加擴建。比較《實錄》前後的記載，則午門增築了兩觀，改成為有中三門、左右掖門的宏大建築，奉天門左右增築東、西角門，奉天殿之左右增築中左門、中右門，奉天門外兩廡間增築左順門、右順門，東安門內增建文華殿，西安門內增築武英殿，另外後宮增築後宮正門，皇城增築端門、承天門、東長安門、西長安門、東安門、東上門、東上南門、東上北門、西安門、西上門、西上南門、西上北門、北安門、北上門、北上東門、北上西門。不但宮城內增築殿門，而且在原來的宮城外增築了一道皇城與一序列的城門。這也是仿自中都的。(註23)皇城、宮城改建完成，遂於洪武十一年(1378)正式罷北京，改南京為京師，是為全國唯一的都城。(註24)(圖2)

南京雖定為京師，但處在江南，形勢上「終不能控制西北」，對防禦蒙古是不利的。(註25)而且南京的風水一直為人所議論，雖然如諸葛亮所云：金陵「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都」；(註26)朱元璋自己也說：「金陵險固，古所謂長江天塹，其形勝地也。」(註27)但在歷史上，南京作為偏安而短命政權首都的這個事實，對大多數人來說，就像一個惡毒的咒語，難以擺脫。明人一直有「金陵，六朝舊地，國祚不未。」「年代不永」的擔憂。而且「以地理家言之，雖合紫微垣局，奈垣氣多泄」。(註28)以宮城論，當時為規劃建築方便，避免建在城內鬧區，須拆遷民居，而選在城東較少人居地方作為建築基地。但這一大片基地的北部為燕雀湖(或稱前湖，相對於玄武湖的後湖而言)，東部南部有土山，為使基地方整，便於依中國都城規劃傳統營建，移土山之土壤平燕雀湖，用打樁的技術，穩固地基。但受填土易下陷或填得不夠平整的影響，「地勢中下，南高而北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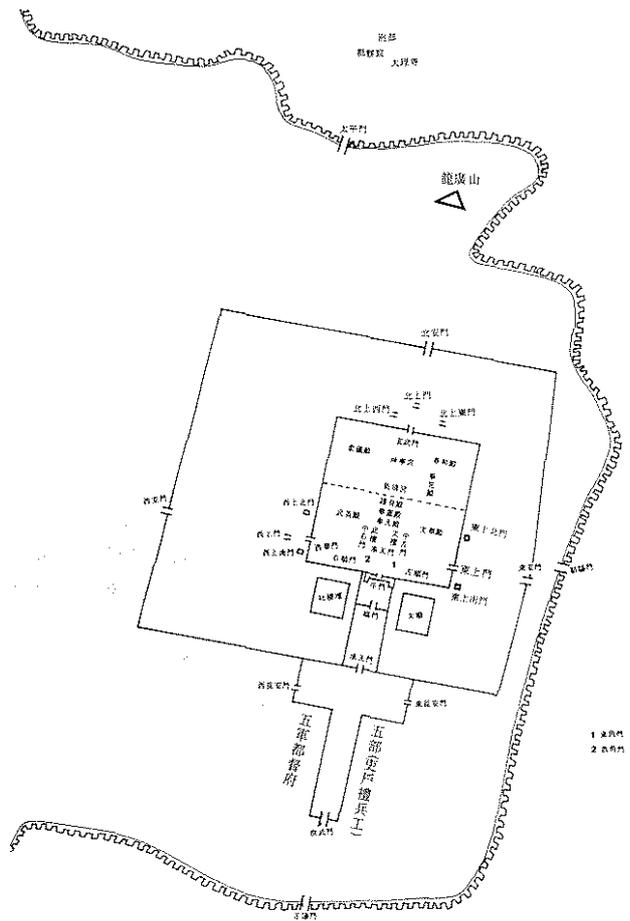


圖2 明初皇城宮城第二期建設示意圖

不合帝王居高以臨下的原則；朱元璋對此頗為後悔，一直想遷都。(註29)洪武二十四年(1391)，遣太子朱標到陝西考察遷都的可能性，不幸太子還京不久便於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病逝，病中猶上言經略建都事。(註30)朱元璋晚年遭此喪子之痛，心灰意懶，他在《祭光祿寺灶神文》中說道：

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事按古有緒。維宮城前昂後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且興廢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鑒朕此心，福其子孫。(註31)

於是這個已建都二十五年和定為京師十四年、其首都地位屢受挑戰的南京，終能確保。既然決意以南京為首都，首都的核心宮城皇城中一些不盡合乎理想的建築布局，必須徹底改造；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下令「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司官署」，「令規模宏壯」，且依「左文右武，北面而朝」之禮，將「宗人府，吏戶禮兵工五部列於廣敬門之東，中左右前後五府、太常寺列於

廣敬門之西」，即將中央官署依左文右武排列於宮城前方的御道兩旁。(註32)隨後又改建欽天監於五府之後，改建翰林院於宗人府之後，詹事府居其次，太醫院又次之；(註33)建鑾駕庫於皇城東、東長安門外；(註34)改建通政使司及錦衣、旗手二衛於中軍都督府之後；建儀禮司於長安街內南，建行人司於西華門外；(註35)並改建大內金水橋，端門、承天門樓及長安東、西二門。(註36)所有工程在洪武廿八年以前完成。於是皇城、宮城布局與規模確定，載在洪武二十八(1395)年十二月完成的《洪武京城圖志》。(註37)因此，洪武二十五年秋開始的整建工程，可以說是皇城、宮城規劃與建設的第三期。(圖3)

總之，由於南京作為首都的地位不定，迭受挑戰，其整建工程頗受影響，但每當一次挑戰之後，其首都地位受到肯定時，明朝政府就開展一次規劃與整建工程。第一期是明朝開國的前夕，從至正廿六年(1366)八月至吳元年(1367)九月，創建新宮殿廟壇與皇城為開國作準備。其後因為遷都問題在洪武二年(1369)被提出討論，與營建中都的關係，南京皇城的建設，只是零星地進行，一直到朱元璋於洪武八年(1375)放棄中都的營建，重新肯定南

京的首都地位時，才開始第二期整建工程。主要是對宮殿門闕制度「稍加增益」，並使其「規模益闊壯」，而且對壇廟沿襲「前代之制」「未盡合禮」之處，加以修改，「更建之為一代之典」，作為洪武十一年(1378)確立南京為京師之準備。(註38)由於主要工程多已完成，此後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之間，沒有太大的興作，只有洪武十七年(1384)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審刑司、五軍斷事官等司法官署於太平門外，算是件重要的整建工程。(註39)洪武十九年(1386)，又有人以「三代漢宋之盛，率居中土」為由，建議「取法前聖，毋安於江左」，朱元璋對此表示嘉許，於是南京的首都地位再度受到挑戰，而有後來太子朱標的關中之行。(註40)但是因為太子的去世，遷都之議作罷，南京的首都地位，再度得到確認，才有第三期整建工程，工程集中在改建中央官署於御街兩旁，並「令規摹宏壯」。從此皇城宮城內的建築群，不但規模闊壯，而且主次分明，秩序井然地分布於北起玄武門、北安門、奉天門、午門、端門、承天門、南到洪武門、正陽門聯成的中軸線兩旁，左右對稱，布局嚴謹。南京皇城、宮城的規模與布局從此確立，其後除了建文帝時銳意依《周禮》改制，而將宮殿門闕改名，及永樂帝改建奉先殿於奉天殿之西外，大致沒有變動。(註41)

二、皇城、宮城的平面布局

皇城、宮城位於南京都城的東部，是填移山填土，新闢的地基，便於規劃建設，雖有「前昂中窪」的缺點，卻也大致平整。其選址是依中國傳統，占卜決定的，史稱：「太祖將營宮★於南京，命劉基相地」，其選在城東，因為東方是屬於震卦的方位，帝居設在東方正合於《周易》：「帝出乎震」之意。(註42)在這地基上，為使建築群體布局秩序井然、安排對稱，必須劃定中軸線，把最重要尊貴的宮殿門闕建中軸線上，將其他建築安置於中軸線兩側。南京皇城、宮城就是以正陽門、洪武門、承天門、端門、午門、奉天門、奉天殿、華蓋殿、謹身殿、乾清宮、坤寧宮、玄武門、北安門聯成的中軸線，依《周禮·考工記》和中國傳統營建都城理想，「象法天地，經緯陰陽」，參考元大都、明中都的規模而建設的。(註43)(圖4)

(一)宮城

宮城俗稱紫禁城，呈正方形，面積約二里見方，即每邊1.1公里，面積1.21平方公里。(註44)其周圍，東、北以古青溪，西、南以新開御河溝渠為護城河。(註45)城門六門，按方位對稱、等距地安排於中軸線上或兩旁。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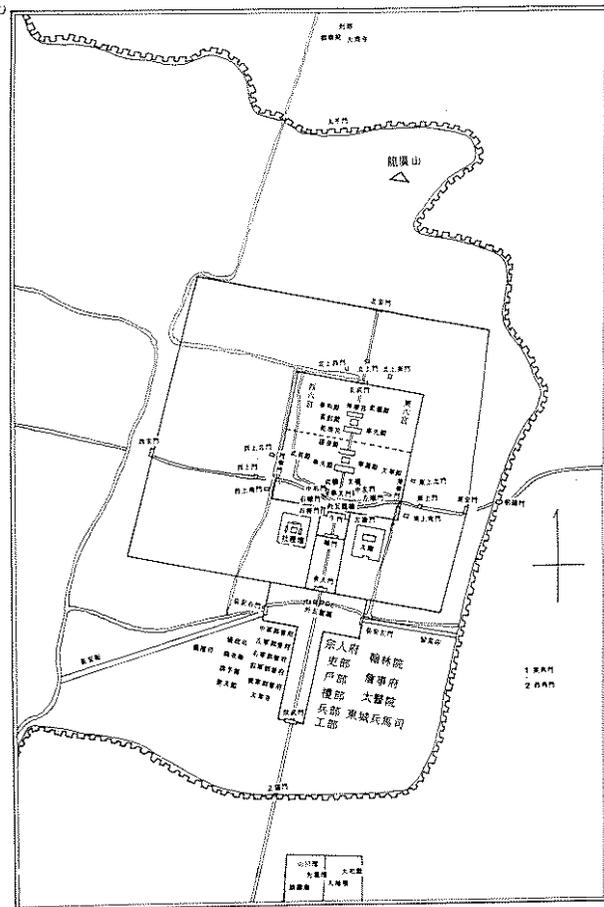


圖3 明初皇城宮城第三期建設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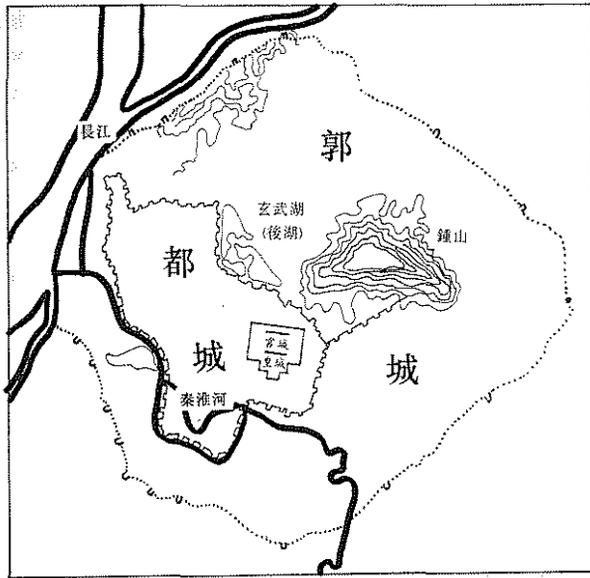


圖4 明初南京城郭示意圖

南曰午門，其左為左掖門，其右為右掖門，東曰東華門，西曰西華門，北曰玄武門。午門與玄武門南北對峙，在中軸線上；東華門與西華門則左右對稱。由於西華門與武英殿、右順門在一條線上，東華門與文華殿、左順門在一條線上，而左、右順門又在「奉天門外兩廡之間」；則東、西華門在宮城東、西牆的南側，與元大都宮城的東、西華門位在宮城東、西垣的中腰部不同。(註46)午門居中向陽，位當子午，因稱午門，高大雄偉，威嚴壯觀，「翼以兩觀」，是座闕門，共有五個門，中三門，東、西又各有一門，即左、右掖門。午門的建制，仿自元大都崇天門，崇天門也是宮城正南門，左右有兩觀，平面是凹形，左有星拱門，右有雲從門。午門、崇天門門名雖不同，形制則近似。(註47)午門高大雄壯，門外是皇帝閱兵之地；而且由於午門象徵天帝居所的南門，品級較高，只有公侯駙馬并文官三品、武官四品以上，准許由其右掖門出入，而文官四品、武官五品以下，則不得出入，只能由左、右掖門出入。文華殿是東宮視事之所，武英殿則為皇帝齋戒時所居。(註48)

午門內為奉天門，門之左右為東、西角門樓，內為正殿，即奉天殿，是皇帝「受朝賀」的場所。殿之左右有門，左為中左門，右為中右門。兩廡之間，左有文樓，右有武樓。奉天殿後為華蓋殿，華蓋殿後為謹身殿。二殿均是皇帝生日、元旦等重要慶典時，「大宴群臣」之地。(註49)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即所謂前朝，是皇帝處理朝政的場所，是宮城的核心，為前後左右各種宮、殿、門、樓所拱衛，象徵皇權至高無上，為眾所拱衛。等同於元大都的大明殿，清代北京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

前三殿之後是另一組建築群體，座落於中軸線上，即所謂後寢，為皇帝后妃生活的後宮。後宮主要由乾清宮、坤寧宮組成；乾清宮在南，是皇帝的寢宮，坤寧宮在北，是皇后居住的中宮。這個地區，相當於清代北京的後三殿。不同的是明南京的後宮只有乾清、坤寧二宮，二宮中間沒有交泰殿。而且後宮只是帝、后生活區，不俾清代以乾清宮前的乾清門為日常聽政的場所。(註50)乾清宮門內之東有奉先殿，是仿宋朝在宮中建欽先孝思殿之意，「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慶及生辰皆於此」，「以奉神御」，「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這種「晨昏謁見」的祭拜祖先的場所，有別於「歲時致享」的太廟。(註51)更突顯後宮為皇帝私生活的功能。此外據《洪武京城圖志》，尚有柔儀殿、春和殿，位置不詳，似乎分布於中軸線兩旁，東西對稱。至於後宮正門與後門是否如明清北京稱為乾清門、坤寧門，《洪武京城圖志》與《明太祖實錄》均無記載，而且是否也有如明清北京位於內廷中軸兩側的東西六宮，記載也不詳。《洪武京城圖志》沒有關於六宮的記載，但《明太祖實錄》載：「謹身殿後為宮，前曰乾清宮，後曰坤寧宮，六宮以次序列。」(註52)則六宮是應該有的，但此六宮是否如北京有東六宮與西六宮，則尚無資料可以查考。如果《明太宗實錄》所云：「初營建北京，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可信的話，似乎應該有東西六宮。則後宮應南有乾清門，北有坤寧門，而東六宮：長陽、永安、長壽、咸陽、永寧、長寧分布於乾清、坤寧二宮之東，西六宮：壽昌、萬安、長樂、壽安、長春、未央分布於乾清、坤寧二宮之西。(註54)

總之，宮城係一位於皇城內圈的方型城。旁開午門、東華門、玄武門、西華門；主要建築群體，列在玄武門、午門一線、北對龍廣山的中軸線上，前朝有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翼以廊廡」，兩旁依左文右武的原則，列著文樓、武樓、文華殿、武英殿等建築群，以拱衛突顯前朝作為宮城核心，象徵皇權至尊的形象。(註55)後寢則以乾清、坤寧二宮為主軸，兩側輔以奉先殿、柔儀殿、春和殿與東西六宮，造成宮城後半段的另一高潮，另一核心。(圖5)

(二) 皇城與中央官署

皇城呈倒凸形，城門正門為洪武門，南與都城正陽門直對，北與承天門直對，承天門外兩側有東長安門，西長安門。皇城東牆有東安門，西牆有西安門，北牆有北安門，東安門與宮城東華門直對，西安門則與西華門、北安門與玄武門直對。至於東上門、東上南門、東上北門、西上門、西上南門、西上北門、北上門、北上東門、北上西門的具體位置，則至今不能確定。明清的記載於此相當混亂，不但位置不清楚，甚至門數也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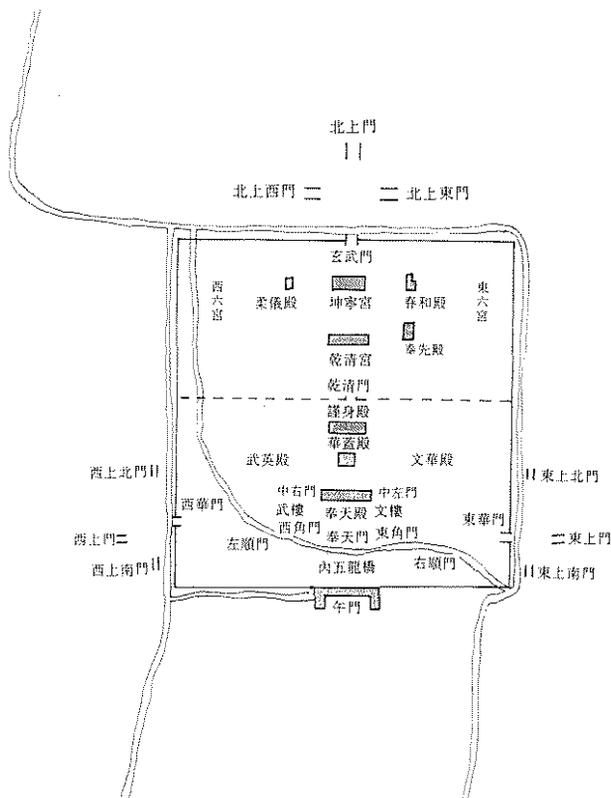


圖5 宮城示意圖

《明太祖實錄》記載了這九門門官的設置，而《洪武京城圖志》「宮闕」項下，僅列東上南門、東上北門、西上南門、西上北門、北上東門、北上西門等六門，而無東上門、西上門、北上門。但既然東上門、西上門、北上門設有門官就應該有門，《實錄》記載是可信的。參照北京皇城規制，這九門應在皇城與宮城之間，而非宮城城門。東華門外，護城河東，通東安門大道上應有東上門，沿護城河東道路，北有東上北門，南有東上南門。玄武門外，通北安門大道上，有北上門，沿宮城北牆大道，東有北上東門，西有北上西門。西華門外，通西安門大道上，有西上門，沿西護城河大道兩旁，北有西上北門，南有西上南門。(註56)也就是由東華門、東上門、東上南門、東上北門構成一封閉的小廣場，玄武門、北上門、北上東門、北上西門間構成一個小廣場，西華門、西上門、西上北門、西上南門間構成一個小廣場，這三個小廣場一方面可呈現宮城城門的雄偉莊嚴，且這九門對宮城城門也有保護作用。

皇城南垣與洪武門正相對的是承天門，前為五龍橋，再往北又有一道門，是為端門，端門更向北，則是正對宮城南門的午門。這便是由洪武門、承天門、五龍橋、端門、午門、再經奉天門、內五龍橋前三殿、後宮、到玄武門、北安門，聯成一條皇城、宮城的中軸線。而

位於午門至洪武門的這條軸線上，建了一條仿漢、元制度，分為三道的御道。(註57)御道兩旁依北魏洛陽以來的都城規劃傳統，布列中央官署，「六卿居左，經緯以文；五府居西，鎮靜以武」。(註58)其中除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置於太平門之外玄武湖畔，文職官署在承天門外御街東，依宗人府、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工部的次序，從北向南排列；另外在五部這一系列官署的東面，又建一系列官署，從北往南，依次為鑾駕庫、翰林院、詹事府、太醫院。(註59)武職官署，主要列在御街西，依中軍、左軍、右軍、前軍、後軍都督府的次序，從北往南排列。另外部分文職官署也設在御街西，如太常寺設在後軍都督府南，欽天監設在太常寺西，通政司、錦衣衛、旗手衛設在中軍都督府西。(註60)根據《洪武京城圖志》的《皇城圖》並參考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繪製的《明北京城復原圖》，在御街東的官署一律坐東朝西並朝西開門，街西官署則一律坐西朝東，朝東開門，門均朝向御道，以示尊崇之意。整體來說，「殿廷皆南嚮」，合乎《易經》「南方為離、明之位，人君南面以聽天下之治」；而五府六部則在宮城南，合乎「人臣則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的禮制意義。(註61)

此外承天門、東長安門、兩長安門、洪武門之間以皇城城牆圍成一「丁」字形的封閉廣場，這一設計是繼承唐長安宮廷廣場的，不同的是其封閉性此唐長安還要強，唐長安宮廷廣場與中央官署之間並不以皇牆隔開，而明南京據《洪武京城圖志》，參考明北京城的規制，則應有牆與中央官署隔開，顯示明代君主威權較唐代更高，尤其洪武十三年廢除丞相制度後，改由六部分擔政務，六部尚書地位遠較丞相為低，更被排除於皇城城牆之外；因此宮廷廣場更少閒雜人等走動，使這個封閉的廣場更加森嚴，襯托宮廷的偉大。這一設計後來由明清北京城所繼承。(圖6,7,8)

總之，皇城為倒凸字型城，以連接午門、端門、承天門、洪武門的御街為中軸線，大體按左文右武的原則，將五府五部等中央官署對稱地分布於兩旁。只有三法司因司刑法，有殺氣，不適合設置於皇城前，而改建於太平門外、玄武湖之東、鍾山之南，象徵天牢的貫城。(記62)

(三)壇廟

自古都城不但是政治、軍事中心，同時也是宗教中心，尤其國家祀典即以加強統治者之尊嚴、強化統治正統性為目的。明代主要的祀典有祭天地、社稷、祖宗、山川等。祭祀的壇廟，是極其尊貴的；因此主要分布於皇城，宮城的中軸線，甚至延伸至都城正陽門以南的中軸線之旁。

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歷代帝王、天下神祇及有城隍之神從祀」，於原園丘地點，建天地壇與大祀殿。(註67)這一設計改變自古以來天地分祭的慣例，是明初都城設計的一大特色，嘉靖年間議禮才改依古制，在北京改建天壇於城南、地壇於城北，而南京似無另建地壇方丘之事。

山川壇在天地壇之西，左為旗纛廟，西南為先農壇。至於朝日壇與夕月壇的制度是洪武三年(1370)定的，《實錄》也有「上朝日于東郊」「夕月于西郊」的記載，但由於《實錄》沒有建築的記載，《洪武京城圖志》也沒有朝日、夕月二壇的記載，方位難以考定，只知一在東郊，一在西郊。(註68)可能是洪武十年改建天地合祭的天地壇時，遷建原來的日、月壇於其中，從祀天地，以致原址廢棄，因而無從察考。(圖9)

總之，壇廟在明初南京皇城、宮城規劃方面，也扮演一重要角色，主要分配在中軸線兩側，尤其祖社位置，改變中國傳統都城舊制，不但利用皇城宮城間的空間，而且自皇城的兩旁或宮城的城隅，遷至午門之前，緊靠中軸御道兩旁，使中軸御道更加突顯，而為後來明清北京城所仿效。而天地壇，先農壇的位置，也為明清北京城所承襲。

三、皇城、宮城平面布局的特點及其象徵意義

皇城、宮城主要是帝王居住與治政之所，是全國軍政的中心。不但在實際上提供一個生活和辦理政務的空間，而且要顯現帝王之居的威嚴；因此規劃的時候，平面布局上要顯現其空間的象徵意義，在使用空間的命名上，也儘量表現象徵意義，以突出皇城、宮城的帝王氣象。

南京皇城、宮城形狀方整，宮城在皇城之中。以城垣論，高大堅固而雄壯；以建築而論，雖然樸素，但規模闊壯，例如午門、端門、承天門都有三個或五個門洞，上有重檐門樓。這正是「象天法地」，模仿宇宙的「大」，在可能的範圍內將皇城、宮城及其中的建築，造得儘可能地闊壯。

其次，在平面布局方面，由於強調中軸線的傳統，使城門城樓、宮殿、壇廟、官署等建築，對稱安排，秩序井然。從洪武門經過兩旁有千步廊、圍牆夾道的御道，而御道外則為排列整齊對稱的中央官署，大致依左文右武的原則，分布於御道代表的中軸線兩旁。通過御道，迎面為一五門洞的承天門與門樓，門前為一封閉的宮廷大廣場，過了承天門，御道收縮，另一座上有高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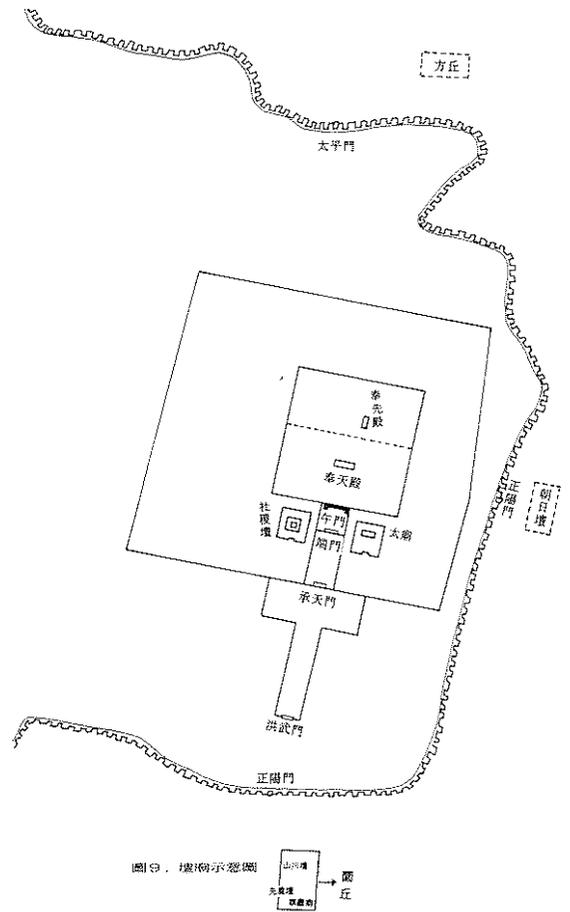


圖9 壇廟示意圖

門樓五門洞的端門便在眼前，而御道東、西兩邊牆外則為太廟、社稷壇，依「左祖右社」原則排列，使御道的中軸線更顯得尊貴。接著又是一個巨大的建築-午門，尤其高大雙闕配上正面三個門洞，兩旁有左右掖門，共五個門洞，門上又有重檐五鳳樓，造成視覺空間的高潮。穿過午門，進入開闊的宮城，在奉天門後，一座五條道路的五龍橋跨在金水河上，過了五龍橋便是一個大廣場，廣場中央有一組由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組成的建築群，高大闊壯，成為皇城、宮城的核心，而為周圍的文武樓、武英文華殿、奉天門、乾清門對稱地拱衛著。過了謹身殿，進入後宮，則是以乾清宮、坤寧宮及東西六宮組成的另一建築群。然後經玄武門，到皇城北門的北安門。從洪武門到北安門，其間建築空間序列重重疊疊，高潮迭起，又秩序井然，即拜此一中軸線之賜，而且重要建築布置於中軸線上，突顯其地位之威嚴。這條軸線不但造成對稱平衡的布局，而且體現中國傳統注重「中」的空間意識，即《周禮·大司徒》擇「地中」建國，是天時、地利、人和最有利的位。不僅擇國土之

中建王都，且擇都城之中建王宮。「中央」是最尊貴的方位，是最有統治權威的象徵。(註69) (圖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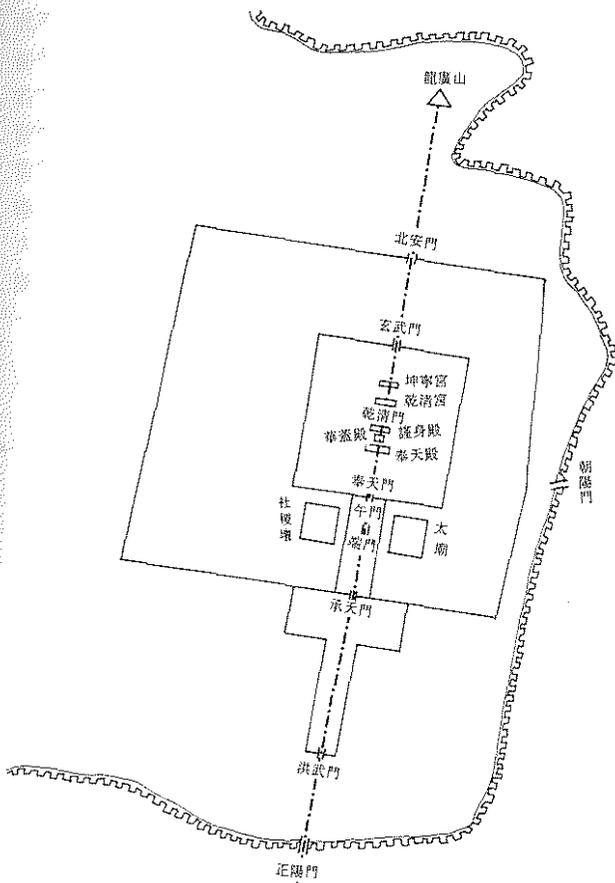


圖10 中軸線示意圖

體現中國傳統都城規劃理想——《考工記·匠人營國》最徹底的是元大都，不但將皇城、宮城置於都城中央位置，而且依「面朝後市」、「前朝後寢」，「左祖右社」規模。這一傳統經明初南京、中都繼承，然後傳給明清北京城。明太宗規劃建設北京時，「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南京皇城、宮城的規劃與《考工記·匠人營國》王城規劃理想典型的關係，最明顯便是以宮城居中，以之為座標，左前方為太廟，右前方為社稷壇，宮城外前方為朝堂，後方為寢宮。祖廟象徵宗法血緣，「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為之宗廟，以享祖考，而致報本之意」。(註70)社稷以示國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祭社必及稷，所以為天下祈福報功之道」。(註71)因此「國之所重，莫先廟社」。(註72)宮城又依中國傳統的說法，天子之門有五：皋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歷代皇宮多依此設門於中軸線上，以門與門來劃分空間，有區別空間使用的功能，是為「前朝後寢」的制度。而前朝

又有外朝、治朝、燕朝的區分。(註73)這一「五門三朝」的制度，為歷代皇宮的主要規制。明初南京皇城、宮城主要也是因襲這一制度。中軸線上，由南而北有洪武門、承天門、端門、午門、奉天門、乾清門，究竟這六門與傳統的天子五門如何相配？說者不一，有人認為洪武門應該除外，而依《明宮史》把承天門定為紫禁城外向南第一重門，(註74)其形制高大雄壯，應為五者最外一重門的皋門。端門則為第二重門，相當於庫門。午門形制最為雄偉，有兩觀雙闕對聳，相當於雉門，因為形制上雉門有雙觀，就位置與形制而論，均相合。奉天門是常朝，天子御門聽政的地方，正合乎「應門居此以應治」的說法，則奉天門相當於應門。而乾清門為寢宮的正門，即路寢之門，則乾清門相當於路門。至於外朝、治朝、燕朝則較難與明初南京宮殿相配，當時不像清代以乾清門為天子聽政之所，沒有燕朝之設。但在路門(乾清門)之外，天子日常處理政務的治朝，則前三殿的奉天、謹身、華蓋可以當之。至於處理百姓事務、審理百姓獄訟的外朝，則因為承天門廣場是一封閉的宮殿廣場，百姓不能接近，就很難說是外朝了。總之，雖然有些出入，但基本上中軸線上宮門的設置是合乎傳統王者「五門三朝」制度的，以此體現皇城、宮城的王者氣象。(圖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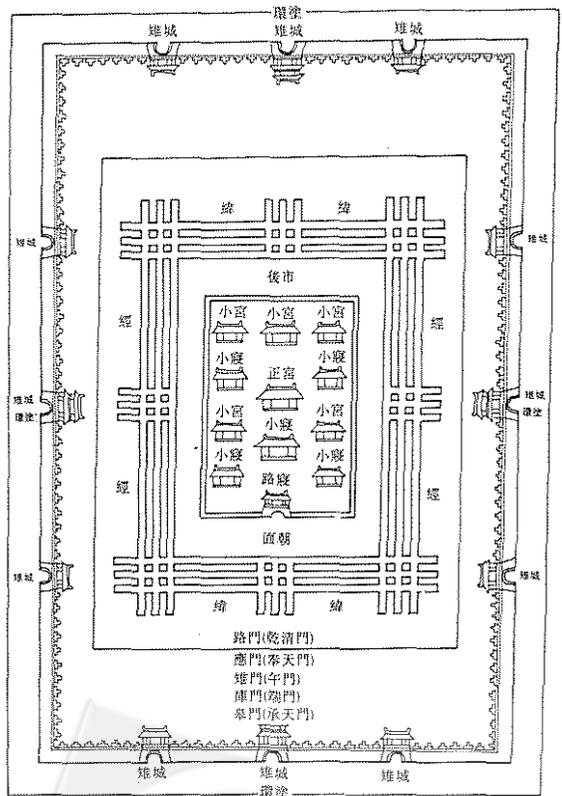


圖11 周王城圖與明南京宮城，皇城城門對照圖
(周王城根據《永樂大典》卷956引《元河南志》)

皇城、宮城的設計除依《周禮》等體現王者氣象外，又以取法天宮來增強其神聖性。宮城前為朝堂，後為寢宮，為皇帝治政與家居生活之地，最為尊貴，不但利用建築群如眾星拱衛中軸線上的奉天、華蓋、謹身、乾清、坤寧的朝、寢，而且模仿天宮為宮殿、宮門命名，以示宮城乃人間帝王的居所，猶如天帝之居天宮一般。天上紫微垣為天帝的居所，正處中天，而乾清宮，坤寧亦處於皇城之正中，相當於紫微垣。不但乾清、坤寧宮名，象徵天地清明，東西六宮，合象十二辰，而且殿閣羅列，如拱衛北極天帝。天上太微垣為天帝的南宮，南宮的正門稱為端門，南宮又有左、右掖門。於是南京皇城在午門與承天門之間，也設一門。取名端門，作為皇宮的前門，而午門兩旁又設左、右掖門；這都表示端門，左右掖門內，以前三殿為主的皇宮，象似天帝的南宮。前三殿中，奉天殿的「奉天」一詞，來自《書經·泰誓》：「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說明君王係奉天愛民者也。(註75)華蓋殿的「華蓋」，係天皇大帝上九星，所以覆蓋大帝之座的，象徵君王所在有如天上的天皇大帝之居止。謹身殿的「謹身」本指「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在此實指君王「效天法祖」，以獲天佑，保其國祚之綿長，是明太祖立下的祖訓。而宮城的北門稱為玄武門，也是取象於天宮，因為玄武正是天之北宮。至於東華門與西華門之命名，則來自道教，因為東華、西華正是道教之仙宮；則皇帝居所不但是天宮，而且是仙宮。

除了皇宮與天宮相對應，天上宮闕，人間皇宮，崇顯君主是天之子的正統性與神聖性外，皇城、宮城的布局、廟壇的位置與命名，又依陰陽學說設計，顯示其配合自然天道的象徵意義，如闕丘祭天，方丘祭地，天為陽，方位為南，地為陰，方位為北，故祭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明初，闕丘置於正陽門外、鍾山之陽，方丘置於太平門外、鍾山之北；即明太祖說的「所以順陰陽之位也」。如宮城南門有午門，南方為陽，午門取義於於正午的太陽，光芒萬丈，輝臨四海，象徵帝王至高無上，威嚴尊貴，如日中天。皇城正對著的是都城之南門正陽門，「正陽」為眾陽之正宗，為人君帝王之象，南面受朝也。前三殿為前朝，居於南，屬陽，乾清、坤寧宮，為後寢，屬陰。因此，外朝主殿布局，用奇數，將三殿之制。後寢主要宮殿，則用偶數，如兩宮、六宮之制。陰陽學說還講求陰陽相濟，即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如後寢相對前朝為陰，但後寢中的乾清宮為帝王居所，乾者天也、陽也，以示君位於後寢的南部，坤寧宮為皇后居所，坤者地也、陰也，以示后住於後寢的北部；則後寢之陰中又有陰陽相濟。且君天后地，又有男女之別、天地之分，進一步彰顯天尊地卑、男尊女卑，乃乾坤正位的「天經地義」。至於皇城、宮城城址選在都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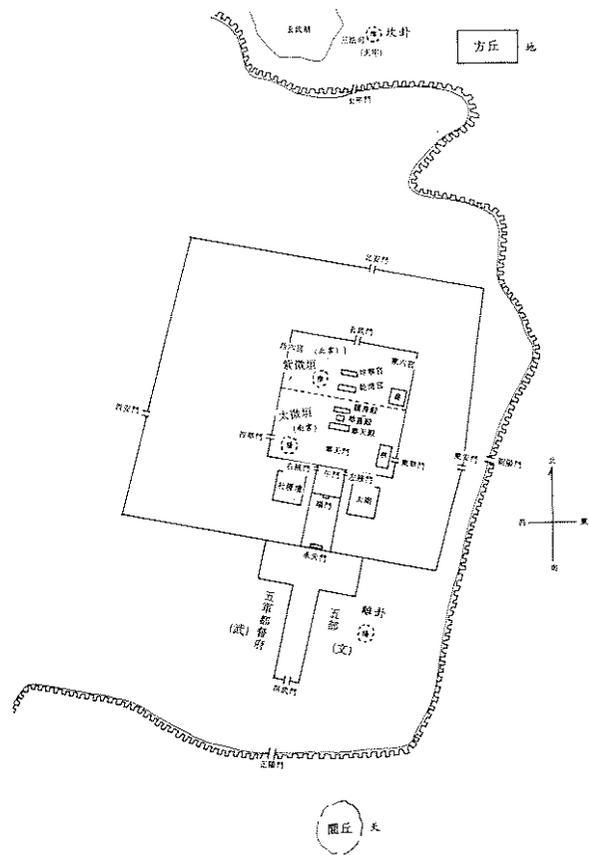


圖12. 皇城宮城與陰陽、天象關係圖

之東，正合於《周易說卦》所云：「帝出乎震」，「震東方也」，且震又象徵龍；則東方是帝王的方位，皇城、宮城是以龍為象徵的帝王居所，理應設置東方。(註76)至於三法司、大理寺、刑部、都察院之設在太平門外、玄武湖畔，也是依「易經」陰陽五行之說；因為三法司主刑殺，屬陰，肅殺之氣重，不適合置於皇城，遂遷建於城北太平門外玄武湖畔，摒之於都城之外，使肅殺之氣遠離。且北方為坎卦方位，坎為水，五行中水德情志主「恐」尚刑，正好適合設主刑法之三法司。尤其三法司位於玄武湖畔，玄武為在天象中位置亦在北，則三法司位置又合乎天象。因此完全不考慮三法司與其他中央官署間之交運不便問題，而依《易經》陰陽五行之說定位置。至於其他中央官署如五府五部等設在宮城南前方，也是合於《周易》的。《周易說卦》又云：

「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註77)

朱元璋解釋說：「南方為離、明之位，人君南面以聽天下之治；故殿廷皆南嚮，人臣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禮也。」(註78)因此，宮城內的宮殿皆面南，以示君主南面而王，而做為人臣辦公處所的中央信署則置於宮殿

南前方，並依左文右武的原則，整齊地排列，吏、戶、禮、兵、工五部設於御道東方，五軍督府置於西方，「北面而朝」。但另一方面，所有官署的方位，並不是坐南朝北，而是在東方(即左方)的五部坐東朝西，在西方(即右方)的五府則坐西朝東；即所有官署不論文武，皆朝向御道，即最尊貴的中軸線。官署建築不能向南，因為南向是君王宮殿專有的朝向，也不能朝北，因為官署建築朝北，向北開口，會沖煞皇宮的。帝王居住的宮城，乃人間天宮，天子的威嚴至尊，除以天宮附會，又經此陰陽、周易學說的闡釋，其神聖性正統性更是世無匹敵了。(圖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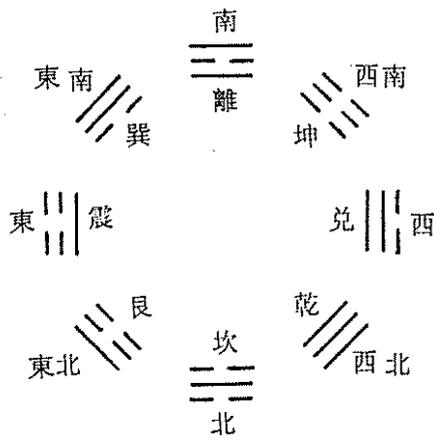


圖13 後天八卦方位圖

總之，透過皇城、宮城的平面布局顯現的空間意義，及門闕宮殿命名顯現的象徵符號，明初統治者在規劃南京宮城、皇城時，相當成功地營造了一既可供統治者使用的空間，又可彰顯帝國偉大、君王至高無上象徵意義的建築規劃語言。

附記：1.南京皇城、宮城遺址，至今未曾作過科學性的全面調查，城牆的長度、規制，皇城、宮城的面積等均無法確定，尤其經過明清之際動亂與太平天國的動亂，遺址破壞得很嚴重。清代這個地區劃為滿城，不屬江寧府管轄；因此江寧府志、縣志中的地圖均未將這一區域劃出來。辛亥革命之時，據傳滿城發生爆炸，遺址毀壞得更厲害。因此只有依據史料來復原明初的規模與布局，而有關史料存留於今日的不多，比較完整的只有《明太祖實錄》與《洪武京城圖志》，但其中語焉不詳之處甚多。本文錯誤之處，可議之處一定不少，尚祈方家

指正。也希望大陸的考古工作者能對現址作徹底的調查，許多爭議的問題或可迎刃而解。

2.明初記載對皇城、宮城未加嚴格區分，據王劍英先生的研究，是萬曆重修《大明會典》時才開始區別「宮城」與「皇城」的。本文為行文清楚起見，採用《萬曆會典》的區分。

3.有關都城布局的宇宙觀與象徵意義，Arthur Wright曾寫過一篇論文"The Cosmology of the Chinese City"發表於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編的《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1977) P.33-73，其中明代以北京為例，未談到南京，本文或可作些補充說明。

4.本文寫作期間獲香港科技大學Direct Allocation Grant的資助，謹此誌謝。

5.本文附圖承賴志彰先生代為繪製，謹此誌謝。

註釋

註1：焦竑《國朝獻徵錄》(萬曆四十四年[1616]刊本)，6/1，王世貞〈宋國公馮勝傳〉。《明太祖實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校印本，1961)，1/9，甲午年(1354)冬十月條；3/3，乙未年(1355)六月丁巳條；3/4，乙未年八月戊辰條；4/1-2，丙申年(1356)三月辛卯條。

註2：《明太祖實錄》：4/3，丙申年七月己卯條。

註3：《明太祖實錄》，20/3，丙午年(1366)四月壬戌條載朱元璋以書諭徐州吏民曰：「…近自胡元失政，兵起汝穎，…彼惟以妖言惑眾。」五月在討張士誠的檄文中更攻擊紅巾軍蠱惑小民，「聚為燒香之黨，根據汝穎，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千端萬狀」。《紀錄彙編》，卷200〈前開紀·平吳仁言〉。

註4：《明太祖實錄》，21/1，丙午年八月庚戌條，同書，21/9，丙午年十二月己未條：「群臣上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度。今新城既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上以國之所重，莫先廟社。」

註5：《明太祖實錄》，21/9，丙午年十二月己未條。

註6：《明太祖實錄》，22/3，吳元年二月丁未條。

註7：《明太祖實錄》，24/7-9，吳元年八月癸丑條。

註8：《明太祖實錄》，25/1，吳元年九月甲戌條；25/10，吳元年九月癸卯條。

註9：《明太祖實錄》，28上/5-6，吳元年十二月癸丑條、丙辰條、丁巳條、戊午條。28下/1，吳元年十二月甲子條。

- 註10：《明太祖實錄》，29/1，洪武元年正月乙亥條。
- 註11：《明太祖實錄》，29/6，洪武元年正月戊寅條。
- 註12：《孝陵詔敕》(1964)台北：學生書局《明朝開國文獻》，1835-1836，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月條。《明太祖實錄》，34/1，洪武元年八月己巳條。
明兩京制度請參閱Edward L. Farmer, *Early Ming Government: The Evolution of Dual Capitals*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 註13：鄧球《皇明泳化類編》(1965)台北：國風出版社影印隆慶間刊鈔補本，80/2，〈都邑〉。
- 註14：《明太祖實錄》，45/3，洪武二年九月癸卯條；80/1《皇明泳化類編》，80/2，〈都邑〉。柳瑛，《中都志》(隆慶三年重刊本)1/16。王劍英，《明中都》(北京：中華書局，1992)2-3。
- 註15：《明太祖實錄》：99/4，洪武八年四月丁巳條。《皇明泳化類編》，80/3〈都邑〉。王劍英(1982)〈《明中都》提要〉《建築歷史與理論》2:162-171。
- 註16：《明太祖實錄》37/21，洪武元年十二月庚寅條，38/1，洪武二年正月丙申條；38/3，洪武二年正月丁酉條；38/3，38/3，洪武二年正月乙巳條，38/11，洪武二年正月癸丑條；39/5-6，洪武二年二月壬午條；39/7，洪武二年二月甲申條；48/3-4，洪武三年正月甲午條；52/6，洪武三年五月乙巳條；59/3，洪武三年十二月甲子條；61/3，洪武四年二月己巳條。
- 註17：《明太祖實錄》，47/1，洪武二年十一月丁酉條。
- 註18：《明太祖實錄》，99/2，洪武八年四月甲辰條；97/4，洪武八年四月丁巳條。王劍英認為明太祖罷建中都的原因是由於工匠反抗，鎮壓之後「百端于心弗寧」而「罷中都役作」，「詔改建(南京)大內宮殿」。參見王劍英，《明中都》，57-62。
- 註19：《明太祖實錄》，114/1-4，洪武十年八月癸丑條；115/4，洪武十年十月條。101/1，洪武八年九月辛酉條。
- 註20：《明太祖實錄》，100/4，洪武八年七月辛酉條；110/1，洪武九年十月己未條。
- 註21：《明太祖實錄》，114/1-4，洪武十年八月癸丑條；115/2，洪武十年十月丙午條。
- 註22：《明太祖實錄》，洪武十年八月庚戌條；120/4-5，洪武十一月十月條。
- 註23：《明太祖實錄》，101/1，洪武八年九月辛酉條；115/4，洪武十年十月條。比較《實錄》吳元年九月癸卯條與洪武二年八月己巳條，有關大內宮殿

、城門的記載與洪武十年月條，洪武十年十一月戊申條有關新建大內宮殿城門的記載，可知原來大內皇城只有午門、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改建成新的大內，將午門、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改成宮城門，而在宮城之外加築皇城，增開了端門、承天門、東長安門、西長安門、東安門、西安門、北安門、東上門、東上南門、東上北門、西上門、西上南門、西上北門、北上門、北上西門、北上東門等。皇城的增築是新內擴建的一大工程。由於記載不詳，過去學者常被明代本身記載所混淆，以致有的說東華門等為皇城門，有的說東安門等是皇城城門，其實洪武十年十一月以前講的皇城城門是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午門，洪武十年十一月新建宮城完工使用以後，史書雖無皇城、宮城明白的分別，但《實錄》說到東安門等則明言皇城城門，說到東華門等則不說是皇城城門，只說是內侍管的門，則其非皇城城門明矣。

- 註24：《明史》(1975)台北：鼎文影印北京中華書局新點校本，42/910、978。
- 註25：鄭曉《今言》《紀錄彙編》卷147，4/13。何孟春《餘冬序錄摘抄》(《紀錄彙編》卷149)，2/15-16。
- 註26：《古今圖書集成》(1986)成都：巴蜀書社影印中華書局排印本，〈方輿匯編·坤輿典〉，112/7399，〈建都部〉〈論南龍帝都垣局〉。
- 註27：《明太祖實錄》，4/1-2，丙申年三月辛卯條。
- 註28：《皇明泳化類編》，80/2，〈都邑〉、《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匯編·坤輿典〉，112/7399-7400，〈建都部〉〈論南龍帝都垣局〉。
- 註29：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四部叢刊》本)原編8/5，〈南京宮殿〉。季士家(1984)〈明都南京城垣略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70-81。據季士家云：「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於1954年在宮城東路射擊場工地，1958年在拆除朝陽門工地，先後發掘漢、六朝墓葬多座，說明東部和南部原來是土山。1958年東安門內200米南京航空學院工地，1972年在西華門內511、714二廠區工地及午門西300米處，在地表下1.5米左右夯土層下，均發現排列有序，每根間距在2至12厘米的成排木樁。樁係杉木，直徑在16至28厘米之間，最粗達36厘米，長在3至6米間，最長達15米，下部削成三角形尖頭，共近二千根。其中還刻有“一丈五尺”，“後宮”等字樣。由此說明，宮城北部和西部為湖泊，這不但與文獻記載相合，而且說明，當時已懂得在回填土地區蓋房，用打樁的先進技術。」

- 考古調查正與《皇明泳化類編》(80/3)所載劉基相宮城地，「即前湖中為正殿，時已立樁水中」相符。
- 註30：《明太祖實錄》，211/2，洪武二十四年九月癸巳條；217/4，洪武二十五年三月丙子條。《明史》115/3549-3550，〈興宗孝康皇帝傳〉。
- 註31：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8/5，〈南京宮殿〉。錢伯城等主編《全明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一冊，頁805。《南樞志》，51/2，〈江東形勝〉：「國朝定鼎金陵，然江南形勢終不能控制西北；故高皇帝已有都汴、都關中之意，…以東宮苑而中止也。」
- 註32：《明太祖實錄》，220/4，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癸酉條。徐學聚，《國朝典彙》(台北：學生書局影印本，1965)，189/1。廣敬門位置不詳。中央官署位置係參照《洪武京城圖志》與北京城的布局推定的。
- 註33：《明太祖實錄》，222/1，洪武二十五年十月己酉條；230/3，洪武二十六年十月條。
- 註34：《明太祖實錄》，235/4，洪武二十六年十一月癸丑條。
- 註35：《明太祖實錄》，235/6-7，洪武二十七年是歲條。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洪武京城圖志》頁32。
- 註36：《明太祖實錄》，222/4，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戊子條，223/6，洪武二十五年間十二月是歲條。端門、承天門、長安東西二門，在洪武十年已建好，此次係增改建端門與承天門的門樓為五開間的建築，至於東西長安門之改建，可能也是建得更闊壯些。
- 註37：《明太祖實錄》，243/4，洪武二十八年十二月辛亥條。
- 註38：《明太祖實錄》，114/1，洪武十年八月癸丑條；115/4-5，洪武十年十月條。
- 註39：《明太祖實錄》，160/11，洪武十七年三月丙寅條。徐必達《南京都察院志》天啟癸亥(三年)刊本，1/16，〈皇綸〉。
- 註40：《明太祖實錄》，179/7，洪武十九年十二月庚子條。
- 註41：《明太宗實錄》，(1962)台北：中研院史語所校印本，7/2，(建文)二年九月壬戌條；9下/3，(建文)四年六月乙丑條；9下/6，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條；9下/8，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丁丑條；19/4，永樂元年四月乙丑條。
- 註42：《皇明泳化類編》，80/3〈郡邑〉。程建軍，《中國古代建築與周易哲學》(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50。

- 註43：關於中軸線的空間意識，請參考王振復(1989)《中華古代文化中的建築美》上海：學林出版社，第一章第二節〈“中國”與建築中軸線的美學性格〉。
- 註43：李賢等《大明一統志》西安：三秦出版社影印天順五年原刊本，6/1，〈南京、城池、皇城〉。陳正祥(1974)〈北京的都市發展〉《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7(1):49,62。
- 註44：參見葉驍軍(1988)《中國都城發展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44。
- 註45：季士家(1984)〈明都南京城垣略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73。
- 註46：宮城、皇城城門，各書或記載不同或含混不清，尤其對東安門、西安門、北安門、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等六門，那些是皇城城門，那些是宮城城門，說法不一。據最近葉驍軍在《中國都城發展史》(247-251)與〈南京明宮城門名考辨〉《中國古都研究》2(1986)203-207，考証的結果，認為明北京的門闔規制，既然「悉如南京」，則可依北京皇城、宮城城門判斷南京皇城、宮城的規制；則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應該是宮城城門，東安門、西安門、北安門應該是皇城城門。此說甚為有理，若佐以《南樞志》與《明太祖實錄》等當代史料，更可證明。《南樞志》載〈國朝都城圖〉圖中有皇城城門，為北安門、西安門、東安門，而《明太祖實錄》(116/1)，洪武十年十一月戊申條載：「置皇城門官：端門、承天門、東長安門、西長安門、東安門、東上門、東上南門、東上北門、西安門、西上門、西上南門、西上北門、北安門、北上門、北上東門、北上西門，門設正、正七品，副從七品。」同書(236/2)洪武廿八年正月壬子條亦載：「置皇城長安、東安、西安、北安四門倉，儲糧以給守禦軍士。」則東安等門為城城門明矣。又據《明太祖實錄》(44/3)洪武二年八月己巳條載：「上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置門官：午門、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奉天門、左右順門、左右紅門、皇宮門、坤寧門、宮左門、宮右門，各設門正一人、副一人。」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與奉天門、午門同屬內侍管理，則其為宮城城門亦明矣。而且《明太祖實錄》(115/4-5)洪武十年十月條載：「改作大內宮殿成。…奉天門外兩廡之門有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順門，左順門之外為東華門，…右順門之外為西華門。」東、西華門在奉天門兩側之外，離中軸線不遠；因此東華門、西華門為宮城城門應是不可置疑的。《南畿志》(嘉靖年間刊本)，

《明史·地理志》及其他清代方志如《同治上江兩縣志》(27上/10-11)、《上元江寧鄉土合志》(頁8)所載東、西華門等為皇城城門，東西安門等為宮城城門，都是不正確的。拙著《明初南京的都石規劃與人口變遷》《食貨月刊》復10:3(1980)亦誤，應修正。朱傑，《元大都宮殿圖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17，〈宮城四至〉；22-23，〈宮城諸門〉。元代東、西華門的位置參閱侯仁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頁170。

註47：《中國都城發展史》，223。《明太祖實錄》115/4-5，洪武十年十月條。

註48：《明太祖實錄》，165/1，洪武十七年九月辛丑條；180/3，洪武二十年二月壬午條。

註49：《明太祖實錄》，115/4-5，洪武十年十月條；165/2，洪武十七年九月癸丑條；177/1，洪武十九年正月戊午條；213/1，洪武二十四年十月乙卯條。

註50：汪萊茵、陳伯霖，《紫禁城》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第三章〈後三宮〉。

註51：《明太祖實錄》，59/3，洪武三年十二月甲子條；61/3，洪武四年二月乙巳條。

註52：《明太祖實錄》，25/10，吳元年九月癸卯條。

註53：《明太祖實錄》，232/2，永樂十八年十二月癸亥條。

註54：周蘇秦〈試析北京故宮東西六宮的平面布局〉《清代宮史探微》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1，299-307。

註55：同註52。又龍廣山作為訂宮城、皇城中軸線的坐標，可由明人所的〈國朝都城圖〉推測出來。可惜明故宮遺址多毀，筆者尚無機會作實地調查，謹誌以待將來。

註56：參閱註46。北上門等九門的位置，說法不一。朱傑《金陵古蹟圖說》(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頁194，將西安門、西上南門、西三北門當作宮城西面同列三門，東安門、東上南門、東上北門當作宮城西面同列三門，北安門、北上東門、北上西門當作宮城北面同列三門。《同治上江兩縣志》(27上/10-11)〈明宮城圖第十〉亦同，且標示東上南、北門在東安門之北，西上南、北門在西安門之北，北上東門、西門則在北安門東西側遠處。而張泉〈明初南京城規劃與建設〉(中國古都學會1984年會論文刊載於[1986]《中國古都研究》2:171-202。未附圖，圖見於葉驍軍[1987]《中國都城歷史圖錄(三)》。)所附之〈明初南京皇宮復原圖〉與高樹

森、邵建光編(1991)《金陵十朝帝王州》(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146)則以東上門位在東安門東華門間大道的中央，東上南門、東上北門則在大道兩旁，其他西上門、北上門等相關位置亦同。若依明代北京皇城、宮城資料推測，則東上南門、東上北門當在東上門南北兩側，有如北京皇城東上南門在今南池子瑪哈噶刺廟西，東上北門在今北池子與騎河樓街西口交界處，似乎不在東華、東安門大道兩側；西上南門、西上北門亦如此，當在西上門南北兩側，有如北京皇城西上南門在今南長街油漆作東、織女橋北，西上北門在今北長街、中部街交界處；北上東門與北上西門則亦當在北上門兩側，有如北京皇城北上東門在北上門東側當宮城北垣東半之中，北上西門在北上門西側，大高玄殿之東。參見《南樞志》(32/7-8)〈國容〉〈凡各衙分定地方〉；(明)劉若愚(1980)《明宮史》北京古籍出版社點校本，5-23，金集〈宮殿規制〉；繆荃孫等(1987)《光緒順天府志》北京古籍出版社據光緒十二年刊本排印，57-78，〈京師志三·宮禁下〉〈明故宮考〉；李國豪等編，《建苑拾英》(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1)，250-251，〈明建北京宮闕〉；侯仁之(1988)《北京歷史地圖集》北京：北京出版社，33-34〈明皇城〉；單士元，(1990)《故宮札記》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4-200，〈明代北京皇城〉。朱傑《北京宮闕圖說》(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4-9，〈明代皇城内禁城外十二門考〉。

註57：《明太祖實錄》，64/5，洪武四年四月辛丑條。

註58：《洪武京城圖志》(1947)南京市通志館依明刊本排印《南京文獻》第3號，頁1，〈洪武京城圖志序〉。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方嚴點校本，1985，1/10，〈皇城〉。

註59：《太祖實錄》，220/4，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癸酉條；230/3，洪武二十六年十月條；230/4，洪武二十六年十一月癸丑條。儀禮司的位置，據《洪武京城圖志》(頁17)是在長安街西南，但《明太祖實錄》(235/6)洪武二十七年十二月條則載：「是歲，…建儀禮司於長安街之東。」依二書成書之先後，《京城圖志》在先，且較接近儀禮司衙署建立的時間，《實錄》則經三修，恐有誤。且該改建記載，附在「改建通政使司及錦衣、旗手二衛于中軍都督府之後」記載的後面，似乎整條記載是記御街西官署的建置。又後代北京「鑾儀司」的位置是放在街西、長安街西南第一列。則有關儀禮司的位置可能《京城圖志》的記載是對的，為謹慎起見，文中不列儀禮司。

註60：《洪武京城圖志》，頁17-20。《明太祖實錄》，220/4，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癸酉條；235/6，洪武二十七年十二月條。明初中央官署主要是中書省、御史台、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廢相改制，將中央官署改為六部、五軍都督府、都察院等，在未改制之前的中書省、御史台、大都督府官署的位置，有關記載不存，或可參考中都的規劃推測。中都的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台，據《鳳陽新書》是位于午門東西，依左文右武的原則，中書省在午門東，大都督府在午門西，御史台在大都督府西，南京的中央官署位置可能也是如此。中都的布局，請參見王劍英前引書頁83-84。

註61：葉驍軍，《中國都城歷史圖錄》，（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7）第三集，頁65、111。《太祖實錄》，220/4，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癸酉條。《南樞志》，38/1-2，〈公署〉，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條。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明清北京城圖》〈明北京城復原圖〉（北京：地圖出版社，1986）。

註62：《南京都察院志》，1/6，〈皇綸〉，洪武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條。三法司的排列，係刑部居中，大理寺居東，都察院位於西。詳見《大明一統志》，6/2-3，〈南京，文職公署〉。

註63：《太祖實錄》，24/7-9，吳元年八月癸丑條；25/1，吳元年九月甲戌條。又同書（100/4）洪武八年七月辛酉條載：「祖宗神室，舊建皇城東北，愚昧無知，始建之時，未嘗省察，是致地勢少偏。茲度地闕左，以今日集材興功。」則太廟始建於皇城東北，然自古以來左祖右社，對稱配置，從未有祖在東北，社在西南之事。且助朱元璋規劃南京的劉基等人皆碩儒，不應不知，此「皇城東北」，疑係「皇城東南」之誤，否則祝詞中不會有「地勢少偏」之語，而應該是「大有偏差」。

註64：《明太祖實錄》，100/4，洪武八年七月辛酉條，114/1-4，洪武十年八月癸丑條。《洪武京城圖志》，頁10。《大明一統志》6/2，〈南京·壇廟〉。集中祖社於闕門左右的設計始自明中都，參見王劍英《明中都》，73-75。明初建社稷壇時，太社與太稷雖在同一地點，卻是分壇而祭的，「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太社在東，太稷在西，壇皆北向。洪武十年遷建社稷壇時，重加檢討，「以大社大稷分祭配祀，皆因前代之制，欲更建之為一代之典」，認為「祭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也」，又引《山堂考索》云：「土爰稼穡，其本一也，社為九土之尊，稷為五穀之長，稷生於土，則社與稷固不可岐而二之矣

。」既然「社稷之祭合而一之，於古自有明証也」，乃「改作社稷壇于午門之右，其社稷共為一壇」，壇上設五色土，將石製社主埋於壇之中，微露其末。於是改變前代社、稷分壇之制，建立合壇的傳統，而為北京所承襲。詳見《太祖實錄》，114/1-5，洪武十年八月癸丑條，《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禮儀典〉第187卷〈社稷禮典部彙考4·明〉。

註65：《中國古代建築技術史》（1989）：台北；博遠出版社，第十二章〈城市建設工程〉，781，第八節〈明清北京城·宮闕設計的特點〉，認為明初拓展北京南城，使宮城、皇城與都城間大為開拓，於是利用這一空間布置祖、社。侯仁之（1979），192。

註66：《太祖實錄》，30/2，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條；24/7-9，吳元年八月癸丑條。方丘遺址不存，但依《實錄》記載確在「太平門外鍾山之北」，雖然交通不便，但為「順陰陽之位」，也只好如此。這種國家祀典象徵性建築，是否合乎陰陽五行理論是第一考慮，交通因素並不重要，三法司不置於皇城而設於太平門外也是如此。堅持依陰陽方位而不考慮實際交通因素的規劃，為明初南京皇城宮城規劃指導思想之一大特色。

註67：《洪武京城圖志》頁10〈壇廟〉。《明太祖實錄》，116/4，洪武十年十一月丁亥條；120/4-5，洪武十一年十月條。朱元璋認為天地分祭，「於心未安」，因為人君是以天為父，以地為母，「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人子事親，曷敢異處」，雖然「分祀者禮之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所以下令「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為定禮」。朱之蕃《金陵圖詠》（序於天啟四年）〈天壇勒騎〉：「在正陽門外三里，定鼎時郊天之所。」

註68：《大明一統志》，6/2，〈壇廟〉。《明太祖實錄》，39/5-6，洪武二年二月壬午條；48/3-4，洪武三年正月甲午條；49/5武三年二月丙子條；55/4洪武三年八月己卯條。

註69：賀業鉅（1985）《考工記營國制度研究》北京：中國建築出版社，頁56。

註70：《太祖實錄》，30/2，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條。

註71：同註70。

註72：《太祖實錄》，21/9，丙午年十二月己未條。

註73：茹競華〈紫禁城位置及中軸線布局的探討〉《禁城營繕記》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152-162。

註74：劉若愚《明宮史》（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新點校本，1980），頁5。

- 註75：《尚書正義》（《四部備要》本，中華書局據阮刻本校刊）11/5，〈泰誓中第二〉。
- 註76：《周易正義》《四部備要》本，中華書局據阮刻本校刊，9/3。
- 註77：同註76。
- 註78：《明太祖實錄》，220/4，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癸酉條。

參考文獻

- (魏)王弼、(晉)韓康伯註、(唐)孔穎達疏
《周易正義》《四部備要》中華書局據阮刻本校刊。
- 王振復
1989 《中華古代文化中的建築美》上海：學林出版社。
- 王劍英
1992 《明中都》北京：中華書局。
1982 〈明中都提要〉《建築歷史與理論》，2:162-171。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86 〈明北京城復原圖〉《明清北京城圖》北京：地圖出版社。
- (唐)孔穎達疏
《尚書正義》《四部備要》本，中華書局據阮刻本校刊。
- (明)朱之蕃
《金陵圖詠》序於天啟四年[1624]，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圖書館藏本。
- 朱傑
1934 《金陵古蹟圖考》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8 《元大都宮殿圖考》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8 《北京宮闕圖說》上海：商務印書館。
- (明)何孟春
《餘冬序錄摘抄》收入《紀錄彙編》卷149。
《前聞紀、平吳仁言》收入《紀錄彙編》卷200。
- 汪萊茵、陳伯霖
1989 《紫禁城》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 (明)李賢
1990 《大明一統志》西安：三秦出版社影印天順五年[1461]原刊本。
- 李國豪等編
1991 《建苑拾英-中國古代土木建築科技史料選編》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 季士家
1984 〈明都南京城垣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70-81。
- 周蘇秦
1991 〈試析北京故宮東西六宮的平面布局〉《清代宮史探微》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99-307。
- 侯仁之等
1989 《中國古代建築技術史》台北：博遠出版社。
- 侯仁之
1979 《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人民出版社)159-226；〈元大都與明清北京城〉227-250，〈天安門廣場：從宮廷廣場到人民廣場的演變和改造〉。
1988 《北京歷史地圖集》北京：北京出版社。
- (明)范景文
《南樞志》明末刊本。
- (明)柳瑛
《中都志》隆慶三年[1569]重刊本。
- (明)胡廣、胡儼等
1961 《(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
《洪武京城圖志》
1947 序於洪武廿八年[1395]，南京：南京市通志館排印。又《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24，影印館藏清抄本，北京：文獻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 (明)徐必達
《南京都察院志》天啟三年(1623)刊本。
- (清)徐松
1985 《唐兩京城坊考》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方嚴點校本。
- (明)徐學聚
1965 《國朝典彙》《中國史學叢書》台北：學生書局。
- 徐泓
1980 〈明初南京的都市規劃與人口變遷〉《食貨月刊》復10:3,12-46。
- 高樹林、邵建光編
《金陵十朝帝王州》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茹建華
1992 〈紫禁城位置及中軸線布局的探討〉《禁城營繕紀》，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 陳正祥
1974 〈北京的都市發展〉《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7:1。

- (清)陳作霖
《上元江寧鄉土合志》清宣統二年[1910]江楚編譯書局刻本。
- (清)陳夢雷等
1986 《古今圖書集成》成都：巴蜀書社影印中華書局排印本。
- (清)莫祥芝、汪士鐸等
《(同治)上江兩縣志》同治十三年[1974]年刊本。
- (清)張廷玉等
1975 《明史》台北：鼎文書局影印中華書局新點校本。
- 張泉
1986 <明初南京城的規劃與建設>《中國古都研究》中國古都學會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171-202。
- (明)焦竑
《國朝獻徵錄》萬曆四十四年(1616)刊本。
- 單士元
1990 《故宮札記》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 程建軍
1991 《中國古代建築與周易哲學》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 賀業鉅
1985 《考工記營國制度研究》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 (明)聞人詮、陳沂等
《南畿志》明嘉靖刻隆慶、萬曆修補本。
- 葉驍軍
1986 <南京明宮城門名考辨>《中國古都研究》中國古都學會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203-207。
1987 《中國都城歷史圖錄》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
1988 《中國都城發展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 (明)楊士奇、楊榮、黃淮等
1961 《(明)太宗文皇帝實錄》台北：中央院史語所校印。
1964 《孝陵詔敕》《明朝開國文獻》台北：學生書局。
- (明)劉若愚
1980 《明宮史》明人呂毳從劉若愚著《酌中志》摘出，北京古籍出版社，據《學津討原》本、明鈔本《燕史》、國學扶輪社排印本點校。
- (明)鄧球
1965 《皇明泳化類編》台北：國風出版社影印，隆慶間鈔補本。
- (明)鄭曉
《今言》收入[明]沈節甫《紀錄彙編》萬曆年間刊本，卷147。
錢伯城、魏同賢、馬璋根主編
1992 《全明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清)繆荃孫等
1987 《光緒順天府志》北京古籍出版社據光緒十二年(1886)刊本排印。
- (明)顧炎武
1936 《天下郡國利病書》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係據崑山圖書館本影印。
- Farmer, E.L.
1976 Early ming Government: The Evolution of dual Capitals.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 Mote, F.W.
1977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in G.W.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01-253.
- Wright, A.F.
1977 "The Cosmology of the Chinese City" in G.W.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3-73.

